

※ 文哲論壇 ※

清代的音韻學與文學革命

張向東*

一、引言

文學革命的起因，包含諸多因素，其中西洋文學的刺激，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但除此之外，中國文學自身的傳統和學術研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學術研究之於文學發展演變的影響，可證諸古今中外的文學史。

清代小學中的音韻學研究之繁盛，在中國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且不說一般的研究者，單是有名的大家，為數實在不少。顧炎武的《音學五書》，江永的《古韻標準》與《詩韻舉例》，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與《聲韻考》，孔廣森的《詩聲類》與《聲類分例》，王念孫的《古韻譜》，江有誥的《江氏音學十書》等，都是很有影響的音韻學著作；加上杭世駿的《續方言》、程際盛的《續方言補正》、錢大昕的《恒言錄》、翟灝的《通俗編》、戴震的《方言疏證》、錢繹的《方言箋疏》等方言研究著作，使清代成了中國歷史上音韻學研究最為繁盛的一個時期。作為清代樸學殿軍人物的章太炎，在古音學研究中成績也不遜於他的清代前輩，有《小學答問》、《新方言》、《文始》、《國故論衡》等行世，給清代音韻學研究添上了一個完美的尾聲。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學術演進中占據著承前啟後的位置。在東京聽他講《說文》的八個弟子都很服膺他的小學，且大半（如錢玄同、朱希祖、沈兼士、馬裕藻、許壽裳、魯迅、周作人）都在五四白話文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為文學革命發起人的陳獨秀和胡適，都出生和成長於清代徽派樸學的發源地安徽，即使他們不以音韻學為專業，我們一點都不懷疑其所受學術前輩潛移默化的影響。蔡元培早在五四時期就認識到文學革命諸君的「漢學遺傳性」：「適之先生

* 張向東，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

出生於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¹

據胡適留學日記記載，他留美之初所讀課餘書中即有《說文》、《馬氏文通》等，他留美後最早的論文之一〈言字解〉也是屬於小學範疇的。胡適在〈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一文中說，文學革命起源於他留美期間關於「漢字存廢」問題的討論，他為此於一九一五年撰寫了〈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的英文論文（這是胡適最早的專業學術論文之一），開始從學術角度嚴肅思考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胡適自己也說：「從中國文字問題轉到中國文學問題，這是一個大轉變。」² 陳獨秀早在一九〇四年五月十五日在他創辦的《安徽俗話報》上發表〈國語教育〉一文，是最早提倡「國語教育」的學者之一。同時，他還在該報登載了方言調查〈皖北的土話〉³，這說明清末白話文宣導者早已將方言納入白話文運動的範疇。陳獨秀在文學革命之前有關語言文字學的論著，還有〈說文引申義考〉（1910年《國粹學報》第68、69期）、《字義類例》（1913年）。陳獨秀一生對語言文字學有著濃厚的興趣，不論是三十年代在南京獄中，還是四十年代在重慶，在環境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語言文字學的研究，著述頗豐。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中說，陳獨秀一九三〇年代在南京坐牢時，「他房裏有兩個大書架，擺滿了書籍，經、史、子、集，每樣有一點，但他對文字學最有興趣，成天埋頭鑽研《說文》」⁴。文學革命發起人的這些學術背景，使我們不得不思考清代的小學，尤其是音韻學研究之於文學革命的影響。

本文意在通過對清代學家從事音韻學研究的心理動機和方言研究的基本觀點入手，分析清代的音韻學研究，尤其是方言研究，和後來對「方言土語」的提倡、白話文的興起之間的關係，從而將清代的音韻學當作文學革命的前因加以思考和論述。

¹ 蔡元培：〈中國哲學史大綱序〉，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2。

²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97。

³ 《安徽俗話報》第20期（1905年6月17日）（乙巳五月望日）。

⁴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51。

二、小森陽一的視角

我將清代的音韻學與「文學革命」放在一起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日本學者小森陽一的啟發。

小森陽一在解釋日本近代國語的形成時，認為本居宣長(1730–1801)對《古事記》⁵的解釋是一個關鍵性事件。因為在《古事記傳》中，本居宣長構造了《日本書紀》/《古事記》、後代之意/先代之事、中華之言/皇國之意等一系列的二元對立：「《日本書紀》因以後代之意記先代之事；以中華之言記皇國之意，故不合之處甚多。然，《古事記》頗無故作高深之舉，實錄古相言傳之事，故其意其事其言皆可互相指稱，皆為先代之實。」⁶據本居宣長的解釋，《古事記》的成書過程是：天武天皇自撰帝皇每日之行及先代之舊辭，以古語口誦，並敕令稗田阿禮奉詔誦習皇室諸事及先代舊辭，再由太安萬侶據此撰寫成書。

這樣，本居宣長為了對抗十八世紀西方殖民主義作為「外部」的介入，編造了一個由「古語」一線相傳的用以維繫具有一貫性和完整性的「內部」與之對抗。小森陽一之所以說是「編造」，是因為有了「外部」的介入才促成了「內部」的出現，「外部」的非連續性和不穩定性使得「內部」的完整性無以成立。小森陽一對本居宣長的這一「編造」過程的揭露可謂一針見血：「『先代之實』純屬子虛烏有。生活在十八世紀的本居宣長在自己的時代是用『假借字連筆文』訓讀原本以漢文書寫的《古事記》，並將其結果記錄下來的。他在幻想自己能夠刻不容緩地製造出所謂的『古語』。其實，民族主義的語言向來是佯裝追本溯源的，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為將來臨時現造『語言』。」⁷

重要的不是這一「編造」本身，而是隱藏其後的動機。小森陽一以櫻井進的觀點解釋本居宣長將《古事記》闡釋為「口傳文學」的動機：

作為有關本居宣長《古事記》出現背景的最新解釋，（我以為）作為近代國家民族同一性之象徵的「大和語」，是在十八世紀後期產生的。這件事與

⁵ 《古事記》，日本最早的以神話傳說為主要內容的所謂「歷史故事集」，成書於西元712年。

⁶ 本居宣長：《古事記傳》卷1，轉引自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

⁷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頁7。

十八世紀後半葉的產業資本主義及其由此產生的西歐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運動以亞洲為對象有關聯。本居宣長並不是毫無目的地、毫無防備地主張「日本」精神及其語言的絕對優越性的。在其背後應該存在著這麼一種主張：作為一個落後貧窮國家的日本在面對西歐列強來勢洶洶的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衝擊之時，一定會發出絕望的回應。也就是說本居宣長並非悠然自得地在主張「日本」的絕對性，而是作為對西歐近代資本主義的一種抗爭在發出吶喊。……儘管他曾談及自己的憧憬，憧憬著一個沒有被古代中國以及西歐世界文化和語言污染過的潔白無瑕的、真正的「日本」國度。但是富於諷刺意味的是他所處在的位置恰恰就是與西歐始發的產業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殖民主義間不容髮的敏感區域。⁸

既然僅僅知道這樣一個動機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小森陽一還要追溯和質疑本居宣長的方法論來源。小森陽一認為：「為了『訓詁出』『日本的古代世界』，我們必須從漢字的表義性和表音性混用的《古事記》的文本中抽離出能夠傳遞『先代之實』的先代聲音。」這一方法，是先於本居宣長的康熙、雍正、乾隆時代「大清帝國」的學者們「編造」出來的。本居宣長之所以能夠「從文字中抽離出聲音」，正是對清代考證學加以利用的結果。小森陽一認為，大清帝國的音韻學家考證「古音」的背景與動機和本居宣長當時面臨的境況有些類似，說那是「一個名為『清』的『外部』介入並支配一個叫做『明』的『中國』之『內部』的時代」⁹。他分析了顧炎武作為明末遺民，其從事於音韻學的研究的動機：

至於明朝遺臣顧炎武(1613-1682)，由於當時像他這樣的遺臣們自己所屬的漢族王朝業已滅亡，便以各種方式開展反清復明的運動，顧氏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撰寫出《音學五書》的，據說直到最後他都沒有改變作為明朝遺臣的氣節。作為結果可以說顧炎武通過溯「古」追蹤到了漢民族的連續性和非連續性，從而創建出漢族的「內部」之聲。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在清完成全國統一、建構起多民族的帝國實體的乾隆帝時代被列為禁書，成為被焚毀的對象。¹⁰

⁸ 櫻井進：《江戶時代的噪音——監獄都市的光與暗》，轉引自同前註，頁9。

⁹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頁15。

¹⁰ 同前註，頁24。

繼承顧炎武的清代漢學中心人物戴震 (1723-1777)，在其《方言疏證》中對語言因時間和空間的差異而形成語音上的錯訛現象的考證研究，與顧炎武如出一轍，都是借音韻學研究追溯漢民族的「內部」一致性和連貫性。小森陽一引木下鐵矢的話說，以「皖派」為中心結出豐碩果實的「清朝考證學」，其方法論得以實現的契機則是對「方言」的重新發現¹¹。

由此可見，清代的「方言」研究，不僅使得方言俗語（白話）的地位得以提升，而且還為他們通過音韻學研究在語言中尋找民族認同，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三、清代的音韻學與「國語運動」

本居宣長借用清代考證學方法編造出「大和語」這個「內部」，以便對抗「中華之言」（漢字）這個「外部」，是否可與清代考證學派的音韻學研究相提並論，還須進一步思考。因為清代的考據學者，雖是在滿族這個「外部」的統治之下生存，但使用的語言文字仍是漢族的，這與日本當時漢字假名混用的狀況並不一致。但清代學者從事於考據學，是在異族政治高壓下的一種被動選擇，他們從事這一研究時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以想像的。假若把顧炎武和章太炎這兩個分屬清初和清末、排滿傾向明顯、且在清代音韻學研究中堪稱開山者和殿軍的兩位人物聯繫起來時，我們發現清代的音韻學研究確實經章太炎、劉師培這些過渡人物的發揮，與清末民初「文白之爭」中某些觀念貫通了起來。

其一，借助考證「古音」這一學術活動，尋求民族國家的「內部」一致性¹²。作為明朝遺民的顧炎武，其從事學術研究的民族主義立場不言而喻。在清朝統治鞏固以後的乾嘉盛世，很難說那些學者的音韻學研究全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動機。但無論怎樣，看似客觀平常的每一種學術研究，其背後的政治動機都是不容抹殺的，不

¹¹ 同前註，頁 25。

¹² John de Francis 在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 一書中對清末以來的切音字運動和白話文運動中的民族主義思想有詳細的論述，他在論到盧懋章的切音字時說：“In making these points Lu was speaking less as a technical reformer than as a nationalist interested in advancing the general welfare of his country.” (p. 34) 並說白話文運動的勝利與民族主義的認同有關：“The victory of the pihua movement was made by i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ause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 11)。

管這種動機是明顯的還是隱蔽的。時至清末，隨著列強的入侵和清王朝腐朽無能的日益暴露，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情緒再度高漲。章太炎的音韻學研究再也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他藉考證「古音」以喚醒民族記憶的意圖。他說：「余以寡昧，屬茲衰亂，悼古義之淪喪，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語原；次《小學答問》以見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¹³「夫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¹⁴「世方瞶惑，余之所懷，且莫難遂。猶願二三知德君子，考合舊文，索尋古語，庶使夏聲不墜；萬民以察，芳澤所被，不亦遠乎？」¹⁵章太炎在這「衰亂之世」對「古義」、「語原」、「本字」、「古語」、「夏聲」的追溯，都是以文字源於聲音，因而「夏聲」與「古義」之間具有內在一致性為前提的。這種藉對「古音」的考證而構造漢族內部的純潔性與一致性的想法，是出於激發種族革命的政治動機：「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種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¹⁶劉師培給章太炎《新方言》所寫の後序中也說：「昔歐洲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故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勳蘊蓄於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以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為嚆矢。」¹⁷

與章太炎同時代的其他主張拼音文字的學者，和章太炎的復古傾向南轅北轍，但其幻想通過「聲音」來建構民族國家的內部一致性的想像卻與章太炎如出一轍。

一八九二年，盧戇章創制切音字，其動機之一就是要通過統一語言將國民凝聚在一起：「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對面無言也。」¹⁸

一九〇三年，直隸大學堂學生王用舟等六人聯名上書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袁世凱，要求「奏明頒行官話字母，設普通國語學科」。書中說，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如能奏請施行，其益有五，其一為「統一語言以結團體」：「吾國南北各省，口音

¹³ 章太炎：《國故論衡·小學略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10。

¹⁴ 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頁43。

¹⁵ 章太炎：《國故論衡·正言論》，頁44。

¹⁶ 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1906年月15日）〉，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8。

¹⁷ 劉師培：〈新方言後序一〉，《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冊，頁135。

¹⁸ 盧戇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頁3。

互異，甚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國人所賴以相通相結者，語言也。言不類則心易疑。此渙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國，類皆文言合一，故團體最固。至於日本，尤以東京語為普通教育，誠握要之圖也。我國無事不規仿泰西，步武日本，獨於此可惜孰甚。今誠用此字母，則上等之人彼自有高深之學問，即庸眾婦女，亦能以言語自達矣。以字母定口音，則南北一致，以語言傳文字，則上下相通。」¹⁹

一九一〇年十二月，資政院特任股員會股員長嚴復在〈審查採用音標試辦國語教育案報告書〉中說：「中國方里三千萬，而蒙藏准回等二千萬里之地，語言全別，感情何由而合。學部籌備清單，自宣統二年至八年，皆有推廣國語教育之事，用意之深，誠以語言救文字之窮，又得音標為統一之助。其於中流以下之人民，需求最切，而於蒙藏准回等之教育效用尤宏。」²⁰ 同年，鄭東湖在他的〈《切音字》之說明書〉中，更是將他以「切音字」（聲音）來喚起「愛國心」（民族國家的內部一致性）的動機表露無遺：「是吾同胞之愛國心為固有之天性，乃生而知之者，非學而知之也。區區島人，胡足道哉。使他日切音字果能實行，則將來收教育之果直與日本相較，吾恐過之無不及也。是則切音字出世之日，乃吾同胞愛國心膨脹之時矣。」²¹

辛亥革命之後，民國建立，五族共和，晚清的民族主義者因滿清政府的被推翻而思路有所轉變，但藉語言維護民族國家統一的想像方式依舊。這從胡適在構建他「國語文學」的理論框架時，對西歐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方言俗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認同，便能見其端倪²²。一九二〇年六月十三日，蔡元培在國語講習所講演時，將國語的「內」、「外」兩個作用界說得如此清晰：「為什麼要有國語？一是對於國外的防禦，一是求國內的統一。現在世界主義漸盛，似無國外防禦的必要，但我們是弱國，且有強鄰，不能不注意國內的不統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響。」²³

通過對清末章太炎等的音韻學研究，切音字運動和五四時白話文運動中「國語

¹⁹ 王用舟：〈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同前註，頁 36。

²⁰ 嚴復：〈審查採用音標試辦國語教育案報告書〉，同前註，頁 135。

²¹ 鄭東湖：〈《切音字》之說明書〉，同前註，頁 140。

²²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 44-46。

²³ 蔡元培：〈在國語講習所的演說〉，新潮社編：《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 年影印本），頁 158。

文學」概念三者之演進脈絡的勾勒，發現其中貫穿一致的是：通過古音、方言、口語等「聲音」構築起一個完整的「內部」世界以對抗「外部」世界的觀念。

其二，除了用聲音構造一個完整的「內部」世界這一民族主義的動機外，清代的語音學研究為清末民初的切音字運動、國語運動中對「聲音」的重視以及注音字母的制定、國音的審定，提供了學理依據和知識基礎。

支撐起清代音韻學研究的一個理論基礎，是認為先有語言，後有文字，即聲音為文字的本原。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將聲音看作是文字、文學的根源所在。他在〈音學五書序〉中說：「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²⁴ 清朝考證學全盛期的乾隆年間，圍繞著段玉裁的《六書音韻表》，當時一些音韻學大家所作的序跋，均能見出相近的觀念。作為段玉裁老師的戴震說：「今樂睹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抑又多通其古義。」²⁵ 吳省欽說：「是書為古音而作也。古今語言不同，古音不明，不獨三代秦漢有韻之文不能以讀，其無韻之文假借轉注音義不能知，立乎今日而譯三代秦漢之音，是書為之舌人也。」²⁶ 錢大昕說：「自文字肇啟，即有音聲，比音成文，而詩教興焉。」「此書出，將使海內說經之家奉為圭臬。而因文字音聲以求訓詁，古義之興有日矣，詎獨以存古音而已哉。」²⁷ 段玉裁的觀點，更能看出他的音韻學研究，將「聲音」與「方言」勾聯起來的意圖。他說：「作字之始，有音而後有字，義不外乎音。」「方言如有萌蘖之蘖，秦晉之間曰肆。水火之火，齊言曰焜。此同部轉注假借之理也；如關西曰迎，關東曰逆，荊郊之鄙謂淫曰遙，齊魯之間鮮聲近斯，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此異部合韻之理也。」「文字起於聲音，六書不外謠俗。」²⁸ 段玉裁「義不外乎音」，「六書不外謠俗」的觀點，從歷史和學理兩個層面提升了方言俗語的地位。

我們不能說近代以來白話文運動中對方言俗語的重新發掘，是直接接受了清代音韻學研究的影響；但我們也不能以此否認從顧炎武、戴震、段玉裁，再到章太炎、

²⁴ [清] 顧炎武：〈音學五書序〉，《音學五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

²⁵ [清] 戴震：〈六書音韻表·戴序〉，[漢] 許慎著，[清]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801。

²⁶ [清] 吳省欽：〈六書音韻表·吳序〉，同前註，頁802。

²⁷ [清] 錢大昕：〈六書音韻表·錢序〉，同前註，頁804。

²⁸ 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同前註，頁833。

劉師培，直至五四文學革命的健將錢玄同、周氏兄弟之間學術上一線相承的學術譜系，對文學革命的影響。而且錢玄同確實說過他文學革命時的「不敢輕視現代的白話」，是受了章太炎「用古語去代替古文」的「古今一體，言文一致」的方言研究思路的影響²⁹。這樣說來，將清代的音韻學放置在「文學革命」中加以論述，也不算是捨近求遠。

我們知道，在清末以降的語言變革運動中，有為數不少的參與者創制了形形色色的拼音文字。由於這些拼音文字是用來拼寫方言的，這在理論和實踐上，勢必要抬高方言俗語的地位。同時，國語運動的成功，是以注音字母的制定和頒佈（1918年）、國音字典的編纂和公布（1920年）、改學校國文科為國語科等為標誌的，這又從制度層面上確立了白話文的「正宗」地位。國語運動的成功，為白話文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成功，為「文白之爭」中白話文最終取得勝利奠定了基礎。從這一點來看，強調清代的音韻學研究之於「文學革命」的推動作用，一點也不過分。

一般人只注意到東、西洋的表音文字對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影響。但事實上，清代音韻學研究對注音字母的制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梁啟超在成書於一九二〇年十月的《清代學術概論》中就指出了這一點。在清代從事於音韻學研究的學者中，梁啟超特別稱賞劉獻廷的貢獻，他說：「蓋自唐釋守溫始謀為中國創立新字母，直至民國七年教育部頒行注音字母，垂閱千年，而斯業乃成。而中間最能覃思而具其條理者，則獻廷也。使其書而傳於後，則此問題或早已解決，而近三十年來學者，或可省許多研究之精力。然猶幸而有全氏（全祖望）傳其崖略，以資近代學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其成法不少，則固受賜多矣。」³⁰而作為章太炎弟子的錢玄同，以語言文字學家和文學革命發起人的身分，對清代的音韻學研究和國語運動之間的關係也有著同樣的認識。他甚至追認劉獻廷為「國語元祖」：「我以為『國語』一詞，涵義甚廣，決非『本國現行標準語』一義所能包括。最重要的有『統一國語，研究方言，製造音字』三義（『改古文為白話文』亦是一義）。而此三義者，劉繼莊均已見到，故言及國語，當托始於劉繼莊也。」「我在我十八歲的那年（即甲辰年）讀梁先生之文而大悅劉氏之學，因改號為『掇獻』，意欲『掇拾劉獻廷之墜緒』也。……深佩劉氏之卓識，時覺國語之任重，以為信能行劉氏之教，

²⁹ 熊夢飛：〈記錢玄同先生關於語文問題談話〉，《文化與教育》第27期（1934年8月10日）。

³⁰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25。

實現國語之三要義，則必能『利濟天下後世』，無疑也。」³¹

梁啟超這裏未能說明清代的音韻學研究，是否有小森陽一所說的那種民族主義動機，但他確實指出了清代音韻學研究與清末民初之切音字運動、國語運動中拼音文字和注音字母創制之間的聯繫：「音韻學又小學之附庸也，而清代特盛。自顧炎武始著《音論》、《古音表》、《唐韻正》，而江永有《音學辨微》、《古韻標準》，戴震有《聲韻考》、《聲類表》，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姚文田有《說文聲系》，苗夔有《說文聲讀表》，嚴可均有《說文聲類》，陳澧有《切韻考》，而章炳麟《國故論衡》中論音韻諸篇，皆精絕。此學也，其動機本起於考證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窮極人類發音官能之構造，推出聲音變化之公例。劉獻廷著《新韻譜》，創字母，其書不傳。近世治此學者，積多數人討論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頒定。」³²一九一三年，讀音統一會最後採用的注音字母，一部分就是章太炎以「古文篆籀徑省之形」創制的注音符號。這也從事實上證明清代的音韻學研究和國語運動之間有著剪不斷密切關係。

四、清代的方言研究與白話文「正宗」地位的確立

從清代的音韻學研究到國語運動中注音字母、國音字典的頒行，這可看作是清代音韻學研究對「國語運動」的顯在影響。另外，從五四白話文運動的觀念來看，顯然是想要以口語入文，以口語改造書面語（文言），即嚴復所批評的「以文字合之語言」³³。對口語的倚重，顯然與清代音韻學研究中以聲音為文字本原的觀念（「作字之始，有音而後有字，義不外乎音」）演進有關。從這一點來看，白話文

³¹ 錢玄同：〈與黎錦熙、羅長培書〉，《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3，頁453、454-455。

³²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51。

³³ 嚴復〈與熊純如書，八十三〉：「北京大學陳、胡諸教員主張文白合一，在京久已聞之，彼之為此，意謂西國然也。不知西國為此，乃以語言合之文字，而彼則反是，以文字合之語言。……設用白話，則高者不過《水滸》、《紅樓》；下者將同戲曲中皮簧之腳本。就令以此教育，易於普及，而幹棄周鼎，寶此康匏，正無如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見王楙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冊，頁699。

的提倡，正是從清代音韻學中對「聲音」優越性的強調（西方所謂「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衍化而來的。因為從理論上講，既然聲音為文字之本，那麼貼近「聲音」的白話優於文言，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近代，將語言中的「聲音」置於「文字」之上，並將其與對口語的認同聯結起來的是章太炎和劉師培。不過，早在一八九七年，陳榮袞就有〈俗話說〉一文，肯定俗話的價值，也是從「文字出於語言」這一觀點推論的。首先，他認為雅俗無定：「今日所謂極雅之話，在古人當時俱俗話也。今日所謂極俗之話，在千百年後又謂之雅也。且不獨古今為然也，以四方而論亦有之。即如江蘇謂我為儂，在江蘇則為俗話，在廣東則為雅也。廣東謂雨傘為遮，在廣東則為俗話，在北京則為雅也。」既然雅俗無定，那麼，重雅輕俗，求雅棄俗，都是沒有道理的，他認為：「古人因俗話而後造字，今人尋古俗話之字而忘今俗話之字，是相率為無用之學也。」³⁴

章太炎認為：「治小學者，在乎比次聲音，推跡故訓，以得語言之本；不在信好異文，廣徵形體。」³⁵「字之未造，語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語言，各循其聲。方語有殊，名義一也……。」³⁶他的這一觀點，是他方言研究的理論基礎：既然語言為文字之本，那麼世移時易，文字幾經變遷，已不能反映其初造時的讀音，但流傳在活人嘴上的語言，雖然「方語有殊」，但仍與古語保持一致。這是他從事方言研究，將方言俗語與古音聯繫起來的依據：「余少窺揚、許之學，好尚論古文，於方言未遑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紬殊語，徵之古音，稍稍得其舐理。蓋有誦讀占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遠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遠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唐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迥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不能徵其何字，曷足怪乎？」³⁷

章太炎的研究方言，確實與五四白話文宣導者有很大不同。既使章太炎的方言研究，在客觀上對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影響與白話文宣導者趨同，我們仍不能將二者等同看待。因為章太炎並不主張言文合一³⁸。或者說，即使要做到言文合一，章太

³⁴ 陳榮袞：〈俗話說〉，《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2期，頁116。

³⁵ 章太炎：《國故論衡·理惑論》，頁43。

³⁶ 章太炎：《國故論衡·轉注假借說》，頁36。

³⁷ 章太炎：〈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第7冊，頁4。

³⁸ 章太炎在《國故論衡·正言論》中說：「言文合一，蓋時彥所囁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

炎也有他自己獨到的方法。一九〇七年十月，章太炎在《民報》上刊載〈博徵海內方言告白〉中說：「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家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劄，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為典語，旁行通國，斯為得之。」³⁹章太炎是要通過溯古的方法，消除語言在使用過程中因轉注、假借等引起的音義錯訛現象，從而達到文字初造時音義完全契合的狀態，這才是他心目中的「言文合一」。

章太炎的考證方言俗語，是要回到他寶愛的漢族文化的源頭上去，藉此鼓舞「愛國保種的力量」。可以這麼說，他是以古音古義為源，而以方言俗語為流的。他「以復古求解放」的思路和胡、陳、錢諸君以「革新為解放」的思路，「動機雖同，方法可是大大的不同」⁴⁰。魯迅也說過：「同是不滿於現狀，但打破現狀的手段卻大不同；一是革新，一是復古。」⁴¹雖然章太炎是通過「溯方言俗語之流」而達「古音古義之源」的，但因為他將方言俗語與古音古義勾聯起來，認為正是在方言俗語中保存了古音古義，從而改變了人們認為方言俗語「鄙俗」的看法。他說：「若綜其實，則今之里語，合於《說文》、《三倉》、《爾雅》、《方言》者正多……。余是以有《新方言》之作。……但令士大夫略通小學，則知今世方言，上合周、漢者眾，其寶貴過於天球、九鼎，皇忍撥棄之為！」⁴²如果說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倡者，如胡適，是從進化論的角度，為言文合一的白話文學尋找學理依據和歷史證據的話，那麼，章太炎則是通過尋古溯源的辦法，將「今之俚語」與《說文》、《三倉》、《爾雅》所載古語等量齊觀，從而提升了方言俚語的地位。這和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八事」之「不避俗語俗字」的論調殊途同歸。

劉師培雖然由於他的變節行為，名聲受損，他的小學研究對文學革命的影響不如章太炎那麼受到重視。但撇開這一點，單就其學術研究而言，他在清末的音韻學

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學日窳。」（頁44）。

³⁹ 章炳麟：〈博徵海內方言告白〉，《民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3年影印《民報》第17期〔1907年10月25日〕），第6冊，頁2843。

⁴⁰ 熊夢飛：〈記錢玄同先生關於語文問題談話〉，《文化與教育》第27期（1934年8月10日），頁5。

⁴¹ 魯迅：〈論新文字〉，《魯迅論文字改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87。

⁴² 章太炎：〈論漢字統一會〉（該文1907年初發表時題為〈漢字統一會之荒陋〉），《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320。

研究及其從音韻學的理論出發來解釋文學的「源始」，與章太炎有一致之處。劉師培與清代其他音韻學家一樣，認為古人「本語言制文字，即以名物之音為字音」⁴³，「文字者，基於聲音者也」⁴⁴。劉師培以文字基於字音，而字義又起於字音的邏輯，推導出文章源於語言，從而為俗語文學的存在找到了依據。他在〈文章源始〉中說：「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時，有語言而無文字。凡字義皆起於右旁之聲，任舉一字，聞其聲即知其義；凡同聲之字，但舉右旁之聲，不必舉左旁之跡，皆可通用。」⁴⁵他認為「言與字分，以字為義」，是因為「文字雖興，勒書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抄胥匪易，傳播維艱」造成的。那麼隨著近代印刷工具的改進與發達，俗語入文就成為必然的事了：「故就文字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蓋文言合一，則識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⁴⁶當然，劉師培主張文言合一，與五四白話文的宣導者也不同。他肯定俗語有存在和應用的必要，一是從「文字基於聲音」、「文字」出於「語言」立論；二是以書寫印刷工具的改進為依據。既然文言分離是由歷史上印刷工具不發達造成的，那麼當這一工具的改善為文言合一提供了條件時，就應充分利用這一條件，使「俗語入文」，盡可能地返回到聲音與文字一致的狀態中去。劉師培的肯定俗語，正是基於他「文字基於聲音」這一看法的。所以他提出，革除中國文字流弊的第一策為「用俗語」（第二為「造新字」），「仿《杭州白話報》之例，詞取達意而止，使文體平易近人，智愚悉解」⁴⁷。這也可算是胡適「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⁴⁸的先聲了。

這裏需要附帶指出的是，劉師培與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他雖當時主張使用俗語白話，但並不主張廢棄文言。他對白話與文言作二元並置處理，是因為他認為白話文的出現是符合文字產生於語言這一規律，並適應了「覺民之用」這一現實需要，而印刷條件的改善也為此提供了可能。而文言分離、文言的形成

⁴³ 劉師培：〈字義起於字音說〉，《劉師培經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20。

⁴⁴ 劉師培：〈文章源始〉，同前註，頁285。

⁴⁵ 同前註，頁284。

⁴⁶ 劉師培：〈論文雜記〉，《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頁319。

⁴⁷ 劉師培：〈中國文字流弊論〉，同前註，頁180-183。

⁴⁸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見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頁43。

也是歷史上的客觀條件——「上古之書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簡質，崇用文言」⁴⁹——造成的，廢棄文言就等於否認文言曾經存在的客觀歷史事實。所以，他說：「近日文詞，宜區二派：一修俗語，以啟淪齊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國學，庶前賢矩範，賴以僅存。若夫矜誇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見其為文也。」⁵⁰

⁴⁹ 劉師培：〈論文雜記〉，《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頁 319。

⁵⁰ 同前註。

徵引書目

- 小森陽一著，陳多友譯：《日本近代國語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胡適：《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許慎著，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_____：《章太炎全集》第7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_____：《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_____ 演講，馬勇編：《章太炎講演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陳榮袞：〈俗話說〉，《近代史資料》，1963年第2期。
- 蔡元培，新潮社編：《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0年影印本。
- _____：〈中國哲學史大綱序〉，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
- 熊夢飛：〈記錢玄同先生關於語文問題談話〉，《文化與教育》旬刊第27期，1934年8月10日。
- 劉師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_____：《劉師培經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魯迅：《魯迅論文字改革》，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
- 錢玄同：《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文史資料選輯》第71輯，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顧炎武：《音學五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嚴復：〈與熊純如書·八十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De Francis, John.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0.